

《资本论》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马丽娜／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资本论》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马丽娜/主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马丽娜主编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620-3290-8

I. 资... II. 马...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A811.23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8965号

书 名	《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zf5620@263.net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325 (发行部) 58908285 (总编室)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国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787×960	16 开本	28 印张 535 千字
版 本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3290-8/D·3250		
定 价	48.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本社发行科负责退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序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这一伟大著作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和历史趋势，用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资本论》所阐明的原理、规律，特别是它的方法论，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的确立，不但不应弱化，而是应该强化这种指导作用。掌握科学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前提，《资本论》充分体现和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篇章，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做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资本论》对于未来社会一些基本特征所做的探讨和论述，其科学性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资本论》揭示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它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资本论》系统和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处理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大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同时警惕和防范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需要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各位老师的集体成果《〈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个探索过程的组成部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是一个以学习、研究和传播《资本论》为己任、充满活力的集体。早在2001年9月，他们便撰写和出版了《〈资本论〉与当代》一书。该书想通过自身的科研实践，创出一条《资本论》学习与研究的新路子：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带着实践中的问题向马克思请教，以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将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将系统和重点结合起来，不求全，而求真、求新、求学以致用。此后，他们根据自己探索出的研究道路，根据发展的经济建设实践，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就《资本论》中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进行探索，形成了本论文集——《〈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该论文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作者针对这些年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包括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股份制问题、企业家问题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既继承已有研究的科学成果，又坚持独立思考，使研究能紧跟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前沿。

第二，贯彻了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本论文集的许多研究内容，直接来自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或来自于理论界一些争论的焦点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作者以向《资本论》请教的态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借鉴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时代特点，提出自己学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在结构安排上，很多论文遵循了提出问题，挖掘和概括马克思的理论，利用理论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或对策的基本结构。

第三，坚持了理论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该论文集的作者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把对《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和传播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和追求。论文集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责任感，力求准确、完整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基本理论与方法。同时，作者又认为，理论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永葆青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吸收一些西方经济学中可为我国所取的营养，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则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成果，论文集难免有不足之处。尽管作者也并不追求对于《资本论》研究的全面性，但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仍不应缺少，如《资本论》中的方法论，值得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看到作者在《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诸多方面进一步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同时，作者的某些观点也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在学术界庆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40 周年之际，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很多学者，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的阵地上。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将会发扬光大。我们也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马洪' (Ma Hong), with a stylized vertical line extending downwards from the character '洪'.

2008 年 4 月

目 录 ||

从《资本论》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体系与结构的创新

- 1 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和范围的拓展/邬名扬 马丽娜
- 12 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考/马丽娜
- 28 试论《资本论》结构的形成/邰丽华
- 36 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的几点思考/侯廷智
- 48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不容置疑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影响力的肯定评价/侯廷智
- 54 一部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之作
——马庆泉博士的《新资本论纲要》简评/邰丽华

劳动价值论及其发展

- 57 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辉煌与未来/邬名扬
- 64 浅谈对商品使用价值属性的理解
——重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札记/侯廷智
- 69 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二重性
——重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札记/侯廷智
- 74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审视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质/支小青

- 82 深化劳动价值论的几点认识/邵丽华
- 91 对劳动价值论“三个暗含前提”的质疑
——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邵丽华
- 99 劳动价值论是“左”祸之源吗?
——再与晏智杰教授商榷/邵丽华
- 107 知识价值的形成丰富了劳动价值论/王一民
- 115 对“知识经济”概念的理论思考/侯廷智
- 125 论斯拉法学说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邵丽华

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与当代赋予的新内涵

- 132 剩余价值论的来源、要点和若干重新思考/邬名扬
- 139 提高劳动强度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吗? /侯廷智
- 144 对资本本性及其历史使命的再认识/邬名扬
- 152 也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难题
——兼与简新华、马迪军先生商榷/侯廷智
- 160 资本存在于商品经济始终/王一民
- 170 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再思考
——兼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侯廷智

再生产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180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邓达
- 187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邓达
- 194 试分析我国制度创新中的经济结构演进/马丽娜
- 20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城乡统筹发展/陈明生
- 215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供求平衡与支持政策研究/刘志雄

- 219 再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刘志雄
- 226 现代失业理论与马克思对就业问题的分析/邓达

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237 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历史的理论反思/侯廷智
- 25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新与发展/岳清唐
- 261 市场机制与资本运营之于资源配置的机理/支小青
- 268 市场激励与科技进步的良性互动机制/支小青
- 275 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侯廷智
- 281 企业最佳规模的理论辨析/李超
- 289 企业家才能及其分析框架/陈明生

所有制结构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297 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马丽娜
- 307 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之谜/支小青
- 316 广义所有制和狭义所有制
——兼论所有制概念的残缺/邬名扬
- 327 所有制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序/邬名扬
- 335 所有制结构的宏观调整的立论基础和方向/马丽娜
- 351 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公平与效率/马丽娜
- 363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性与国企改革的反思
——对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理论的重温/侯廷智
- 373 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马丽娜
- 377 中国家族制私有资本制度创新的思考/马丽娜

392 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新探/马丽娜

402 论员工持股与剩余索取权/邵丽华

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412 《资本论》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齐勇

420 试论公平、效率的制度保障/马丽娜

432 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若干理论误区分析/邵丽华

【从《资本论》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体系与结构的创新】

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科学界定和范围的拓展

邬名扬 马丽娜

一、经济学整体创新，该从何处突破、何处入手

许久以来，总想约请或远或近的一些新老朋友们，尝试去做一件大事，即设法跳出马克思《资本论》已有的逻辑架构，重新安排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以便大容量地注入新意，使它能进一步贴近当今的时代和百姓的生活。

在我们心目中，《资本论》是当今世界上最神圣的一部书。1843年，对《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而言，是极不平凡的。因为，这一年，他经历了自己漫漫人生路一次最重大的转折：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迅速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他开始立志，要解剖“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制度。从1843年起至1883年马克思安详地静坐在写字台前逝世止，马克思整整用了40年时光，倾其毕生的精力，才最终完成了《资本论》及其草稿的写作。马克思在世时，《资本论》只正式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替他整理出版的。第四卷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单列的书名于20世纪初由考茨基编辑出版。可惜他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重又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按马克思手稿的内容与次序，原汁原味地出了俄文和德文的新版本。综观马克思的一生可以说，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这部鸿篇巨制牺牲了他的健康和幸福。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正式交付出版后，马克思曾经写信给迈耶尔称：“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条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

我没有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实际的。”^{〔1〕} 感谢《资本论》及其作者，是他为我们党提供了理论武器，并照亮了我们几代人的生路。

《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是《资本论》突出的优点和长处所在。马克思本人对此极为看重。《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一年，1866年2月，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这样称道自己的《资本论》的“四卷结构”。他说：“……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2〕} 马克思向来是十分谦逊的。他对《资本论》结构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还把该著作称作“艺术的整体”，表达了他对《资本论》现有结构科学性的充分肯定。《资本论》没有专门章节单独论述该书结构，但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贯穿全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理解该书结构，就不可能真正清楚深刻地理解该书体现的世界观、方法论，就不能清晰深刻地领会该书共同构成的完美整体。明白了《资本论》的结构是何等精美，意义是何等重大，也就会明白面对《资本论》传统架构，为什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常常想跳出却又无从跳起，有时甚至怯阵到连跳都不敢想的地步。

然而，变革和创新终究是时代的需要。

试想，一部书，一门学科，其体系架构，说到底，是为其理论内容服务的。时代的主题变了，阶级的历史使命更新与升级了，伴随着理论内容的更新，传统的理论架构必须首先被打破。否则，该理论从内容到形式，就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适时更新。这样，无论其昔日何等辉煌，仍然会逐渐失去生机和活力。

这使我们不由得抚今忆昔感慨丛生。

旧中国，在白色恐怖下，许多热血青年手捧着书皮被伪装成譬如《红楼梦》的《资本论》，冒着砍头坐牢的危险，孜孜不倦地阅读他（她）并期望从中探寻出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我们父兄几代人曾经有过的经历。

如今，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阶级的使命，至少在中国，已经从埋葬旧世界，转向建设新生活。仁人志士，昔日忧的是如何救国救民，如今虑的是怎样富国富民。青年一代以渴慕的眼光，焦急地要求回答：为什么苏联东欧，会发生那样惨烈的剧变；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际，为什么会居于主导和领先地位；第三世界诸多国家在获得近半个世纪独立后，为什么至今依然挣扎在贫穷和饥寒交迫之中；社会主义中国面向跨世纪的未来如何

〔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2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页。

圆自己强国之梦。凡此种种，问题的清单几乎可以无限地去拉长。

谁能够清晰地、令人信服地、科学正确地回答这种种问题，谁就能赢得当代先进青年们的心，并主宰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离开《资本论》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理论内容，谁都无法科学正确地回答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死守着《资本论》所提供的传统理论和形式，不思进取，同样无法科学正确地回答上述种种问题。

这就是说，面对《资本论》，虚无主义不可取，教条主义不可行。要坚持，必须发展。唯有发展，才能坚持。

这使人不由得想起中国的国粹京剧，其唱念做打，一招一式，已经完全成熟为程式化了，要变革就非常难。变革过了头，失去京腔京韵，戏迷就不认可，就不是京剧了。但不变革，不注入鲜活的新意，也难保不失去活力和未来。

类似京剧改革，我们认为开始时主要应注重神似而不要拘泥于形似。变革难免会走些弯路，有些失败，付出若干代价。比照旧京剧，只有通过众志成城不懈的努力和时光的磨砺，才能最终形神俱备，并从内容到形式，升华到新的水平。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神”在哪里？我们以为就是内含于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以及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制度分析。这一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世之宝。

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秘密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暂时性、过渡性及其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客观必然性的揭示的理论内容就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时代毕竟前进了，至少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升级了。面对新的实践、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形式，包括某些重要命题的提法和表述，必须有重大的调整和更新。而突破传统结构，显然应首当其冲。

这一切该从何处入手，我们以为关键是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着眼于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有公认的研究对象，既要正本清源，更要注入新意，调整和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旦研究对象被重新界定，传统的各种条条框框就会被打破，丰富的新鲜活泼的内容就会被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就会被提炼，新的理论体系和架构就会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可见，从变革的全局看，调整和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关键的一招。这如同下棋，一招得手，势必会全局皆活。

调整和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从根本上说，必须符合时代和自身的需要。同时，必须保持和发扬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贯的理论特色和长处。进而，还要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同步。在划清界限的同时，要尽可能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吸收营养。为此，着眼于研究对象，将东西方理论经济学作一番比较分析，这样人们的心境会因此而豁然开朗，会产生丰富的联想进而准确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未来成长的脉搏。这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真正用意所在。

二、为什么我们的路子越走越窄

着眼于研究对象，对比东西方经济学，突出的感觉是他人理论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宽，而我们自身研究的路子却越走越窄。

究其原因，我们以为在于“左”的禁锢。

迄今为止，打开我国法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均言之凿凿，明示读者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生产关系及其规律。至于生产力，据说对理论研究顶多具有“出发点”或“方法论”的意义。所有的教材中都是这样表述的，即研究生产关系时要联系生产力。这样轻轻的一笔，就把生产力排除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

按照上述意见，如果谁把生产力纳入对象，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对象”或“本题”去研究，是否就“犯禁”、“越界”，就自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呢？符合逻辑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及吓人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确实多次有人以身试法，值得提及的，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雅罗申柯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1〕随后，他又写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重申他的见解，并建议准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请求给他配备两位助手来协助他做这一工作。他的意见和请求惹怒了斯大林。斯大林批评说：“他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斯大林非但拒绝了雅罗申柯编书的请求，还讽刺说：“他的请求中充满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2〕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斯大林对于雅罗申柯的这一讽刺，显然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

第二次，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学者李平心先生，以十论生产力性质为中心，先后写了18篇论文，强调研究生产力的意义，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7～48页。

〔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47页。

“平心生产力理论”，其中包含有诸多真知灼见。值得关注的是，平心先生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应包括生产力，并提议把政治经济学正名为“经济学”。平心先生的论文，曾引发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这是正常的。但在当时“左”的禁锢下，平心也承受了许多尖锐的政治攻击，致使他身心憔悴，破坏了健康。

第三次，改革开放初期，以熊映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再次提出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经济科学的首位。这次学术空气虽然与已往大不相同了，但上述意见仍被主流派所否定。妥协的结果是：一方面继续坚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排除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却网开一面，允许自立门户，成立独立的生产力经济学。近 20 年的科学实践证实，丰富生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是不该分割成两门科学各自独立去研究的。作为贯穿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最基本的矛盾，总得有人去研究。研究这一矛盾，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准确地说是理论经济学固有的研究对象和应尽的责任。

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的研究对象重新作一番审视和澄清。

在马克思开创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年代，生产资料所有权垄断在资本家和地主手中。雇佣工人只有能够为他人提供剩余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和生产剩余产品，才被准许就业从而允许生存。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特点和优点，无疑是强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力排除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即“本题”之外。他不但言词明确，且行止一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科学实践自始至终是把对生产力的研究置于首位，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置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理论，而且浸透在他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原理之中。也正因为此，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才是唯物的、辩证的。他把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结合运用时，才能有的放矢。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作些简明的论证。

首先，听其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具体阐述中，他进一步明确说“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这里，“对象”也好，“本题”也好，显然都包含相应的生产力。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陈述了相同的意见。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然，人们尽可以进行种种考证，硬把生产力排除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外，但这样的考证近乎文字游戏，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其次，重要的是查其行。熟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人都知道，如在《资本

论》中，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重要概念下过一个定义。他研究问题从来不是从定义出发，孤立地去进行逻辑推演，而总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抽象出相应的概念，把逻辑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统一起来。他对于商品、货币、资本的研究无不如此。不仅如此，在许多理论体系关键之处，他总是捧出专门篇幅，浓笔重墨地专门深入剖析生产力的结构、性质、状况、作用、发展趋势和客观要求等。前者，例如对商品，马克思强调说：“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1〕}这里明显说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隐含在商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虽然他研究的侧重点是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后者，仅就《资本论》第一卷而言，例如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艺”、“机器和大工业”，以及对“决定积累量的情况”的分析等，都是突出典型。

最后，应该明其理。笔者认为，纵观各类科学，识别矛盾特殊性从来是界定各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哲学依据。例如数学研究正数与负数，力学研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化学研究化合与分解，电学研究正电子和负电子，生物学研究同化和异化等。而对于贯穿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政治经济学理应责无旁贷地确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里不限于研究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重要的是把握二者矛盾的运动。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何者应作为研究的侧重点，则应该体现时代特点，把握理论与现实的需要，不必画地为牢，设置某种禁令。

仔细想来，即使我们把生产关系的研究作为侧重点，也仍然应该把对生产力的研究置于首位。因为：其一，一定的生产力是一定的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依托。其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生产关系变动的终极原因、变动程度和变革方向。其三，是否适应生产力性质、状况和发展的要求，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合理、是否优越、有无存在理由的客观依据或尺度。其四，生产关系的变革或维护，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于以上原因可知，对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研究，无论就其存在的基础、变动的原由、判断的尺度、变革的目的而言，均不能离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要求，孤立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做文章，贪求“一大二公三纯”，搞所谓“穷过渡”，搞得人心惶惶、国无宁日、代价沉重。这一沉重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三、何以他人的路子越走越宽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我们把自身理论研究的路子限制得越来越窄小时，西方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0页。

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路子却越走越宽，其对象范围一再拓展。这就更加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仿照西方，即超越于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把本来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问题，拿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算不算“违禁”、“越位”或“胡来”。我们的回答是不。这不仅不是胡来，恰是跟上时代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研究对象理应作出适时的调整和扩展。

让我们先看一看西方一些典型事例。198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奖励他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从此，政治家经济人的本性被确认，政府行为圣洁的灵光被祛除，政治市场的黑箱被开启，政治制度的意义被确认，政府行为失败与成功的奥秘被破译，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被开创。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授予了科斯。科斯终其一生，只发表过18篇文章，其中两篇，即《企业的性质》及《社会成本问题》使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前一篇发表于1937年，确立了交易成本的理论与方法。后一篇发表于1961年，创立了“科斯定理”。综合这两篇文章，公认科斯开创了两门经济学，即产权经济学和法经济学。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他的《人力资本》一书发表于1964年，该书被恰当地描述为“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这场革命曾席卷了60年代的经济学界，并影响至今。贝克尔对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早在1957年，他在其博士论文中，就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了劳工市场的种族歧视。60年代末，他又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了犯罪惩罚问题，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特定情况下，某些人之所以犯罪是理性的选择。此外，他还因为富有成效地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结婚与生育、子女抚养、离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其成员分工协作的“联合效用”等问题，而享誉全球。

1993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突出贡献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经济计量学的一般方法，重新解释了历史。值得提及的是，他论证了美国历史上体制变革过程中产权的意义。他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崛起：新经济史》使人深刻认识到制度创新的意义。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一书深化和拓展了他的新历史观。

以上种种使人不由地猜想，既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已不断地与经济学交叉浸透，那么，如果有一天，经济学的研究足迹踏遍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每一个角落，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这种变化趋势移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来，是否允许，是否